

# 成都市金沙遗址考古发掘获重大收获

朱章义    张擎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青羊区苏坡乡金沙村，是2001年2月8日新发现的一处商周时期遗址。由于该遗址在机械施工中就出土了1000多件与四川省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遗物相似的玉石器、铜器、金器等，因而引起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目前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之中，很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考古发掘研究。兹将金沙遗址发掘情况简介如下。

## 一、金沙遗址简况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西郊，距成都市区中心约5公里，北邻摸底河，与黄忠遗址（商周时期的蜀文化遗址）隔河相望，东临青羊大道。遗址面积数十万平方米，是一处大型的商周时期巴蜀文化中心遗址。经勘探和发掘已确认出土重要遗物的遗址中心区面积约10000平方米。考古发掘工作从2001年2月中旬开始，到7月底止，已发掘面积3000多平方米，发掘深度约1.3米，约当商末至西周时期的第8层。

遗址中心区域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文化层多，堆积厚，达4-5米，这在成都平原是十分罕见的，从现有断面分析，金沙遗址中心区域的文化层至少可分16层，目前已发掘至约当商末至西周时期的第8层；二是遗迹现象和遗物极为丰富，在机械开挖的剖面上至少发现三个埋藏有大量象牙、玉石器和铜器堆积坑（暂定名），在发掘过程中又发现了大面积的獠牙、鹿角、玉石器、象

牙、美石和陶器堆积，成片的倾斜放置的石璧、石璋半成品堆积等，已出土金器、玉器、铜器、象牙近2000件；三是地层中出土大量的玉石器、青铜器、象牙等遗物，在已发掘的探方地层内出土了约800件器物。综上所述，金沙遗址出土遗物的总体风格和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遗物相近，出土陶器也具商周时期特点，其时代约当商周时期，是一处典型蜀文化遗址。遗址中心区域的性质可能和祭祀有关，性质的最终确认尚待发掘与研究。

## 二、金沙遗址出土文物简介

至2001年4月底，金沙遗址已出土玉石器、青铜器、金器、象牙器等珍贵文物1200余件。

**金器** 数十件。器类有金王冠带、金面具、圆形鸟纹金箔饰、人形金箔饰、金喇叭形器、金球拍形器、金盒形饰等。金面具高约5厘米，眼、口镂空，其造型风格、装饰方法与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金面具相似。金王冠带用金条锤打而成。其上有四组相同的图案，每一组图案都为鸟、鱼、箭和人面图像的组合。图案的造型、内容，包括很多细部装饰都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出土的金杖相同，反映了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的文化渊源关系。

**青铜器** 近500件。器类有铜立人像、牛首、铜鸟、铜瑗、铜璧、铜眼形饰、铜眼泡、铜戈、铜铃、铜挂饰等。铜立人像高20厘米，立于座上，双手握于胸前，可能是一大型铜器的配件，其造型风格与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相近。牛首、铜鸟、铜瑗、铜璧、铜眼形饰、铜眼泡、铜戈、铜铃、铜挂饰等小型青铜器与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小型青铜器基本相同。金沙遗址目前仅发现少量的尊等礼器、异形器等大型青铜器残片，预示金沙遗址将有可能出土大型青铜器。

**石器** 200余件。器类有石矛、石璧、石镑、石斧、石璋和石雕

像。以石跪座人像、石虎、石蛇、石龟等石雕像最具特色。其中石跪座人像高17-25厘米，呈跪坐状，长辫及腰，双手反缚于腰间。石虎高15-22厘米、身长18-28厘米，呈半卧姿，昂首，张口，头部刻有纹饰，口内涂朱砂，表现出虎张开血盆大口的姿态。

玉器近500件。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十分丰富，多为礼器、工具、兵器，多无使用痕，应是祭祀用品。玉器的器类有玉琮、玉璧、玉璋、玉圭、玉牙璧、玉瑗、玉戈、玉矛、玉剑、玉钺、玉戚、玉刀，玉铲、玉斤、玉斧、玉铎、玉凿、玉凹刃凿形器、玉镯、玉环、玉贝形饰、玉珠、玉圭形器、玉牌形器、玉异形器、玉箍形器及玉料等。经肉眼观察和初步鉴定，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绝大部分属透闪石软玉类，其它仅有少量的阳起石玉和蛇纹石玉等。其中以玉璋、玉凿、玉瑗、玉凹刃凿形器为主。

我们知道，从玉料到雕琢成玉器，一般都要经过选料、开片、设计、打磨、钻孔、雕刻和抛光等多道工序，金沙玉器当然也不例外。

切割：金沙玉器的切割主要有锯切割和线切割二种。锯切割主要适用于器型较大的遗物。大型玉璋的表面一般都残留有一个台面，是切割玉料制作玉璋的坯体时遗留下的痕迹。从切割时留下的痕迹可以看出，切割是从玉料的两侧分别向内切割，一次切割的长度达到50-80厘米，最长可能在100厘米以上，切割的深度在10厘米左右。这种切割法对技术要求特别高，两个切割面很难在同一水平面上而留下一个断面，打磨时也不可能将这些断面完全磨掉，从而留下了完整的切割线，这为我们研究当时的切割技术提供了非常好的资料。切割的末端一般都非常平直均匀，切割口不呈“V”字形，加之切割的断面非常小，不可能用竹片或石片之类的切割工具，应是采用青铜质的长条形片状工具，切割工具的厚度在1毫米左右，反映了金沙遗址制玉工艺的水平非常之

金沙玉器除大量使用锯切割外，也使用线切割，这种方法主要用于小型器物的切割，其特征是切割线呈抛物线，金沙遗址出土了较多的线切割标本。

钻孔：钻孔工艺在金沙遗址中运用十分广泛。早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就已发明了用石锥、石钻进行钻孔，到良渚文化时期已出现了利用绳或皮条拉动钻头高速运转进行钻孔的工艺。金沙遗址出土玉器的钻孔不但运用在大小不一的各类玉石器上，而且在石雕像中也大量使用。根据钻孔上残留的痕迹判断，钻孔主要有实芯钻和空芯钻二种。

打磨与抛光：金沙玉石器的打磨与抛光可能有三道工序。首先是在坯体制作之后进行初打磨，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相关的打磨工具，可能是用较为粗糙的石质物加上琢玉砂进行打磨；然后用细腻的硬度较高的磨石加上琢玉砂进行第二次打磨。在金沙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质感细腻的玉磨石，表面十分光滑，在放大镜和显微镜下观察，玉磨石表面磨擦痕多在一个方向，磨擦产生的痕迹都非常细，也很浅，应是在打磨玉器的精加工时使用的一种工具；最后在玉器表面用皮一类的软质物进行抛光，这在其它考古学文化的玉器制作工艺中也广为应用。

雕刻：在玉器表面雕刻各种纹饰是玉器制作的一道重要工序。从金沙遗址已出土的器物看，雕刻工艺有透雕、浅浮雕、阴刻和微雕等。

### 三、与其它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金沙遗址出土的多节玉琮，特别是有兽面纹和微雕的多节玉琮，与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非常相似，甚至有学者认为与良渚玉琮相同，难于区分；也有学者认为与良渚玉琮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但形似而神不似，不是良渚文化的遗物。我们认为金沙遗址出土

的这—件多节玉琮和玉凿、玉镯（箍形器）等遗物与良渚文化的同类器物有相似之处，金沙遗址与浙江良渚文化的关系尚需深入研究。

金沙遗址中出土的玉钺、玉戚、玉戈等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殷墟等地出土的同类物相似，说明文化的交流十分频繁。商周时期，成都平原的古蜀国同中原地区的关系十分密切。周武王伐纣，蜀是周的盟国之一。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也有征蜀、伐蜀的记载，金沙遗址出土遗物多实物资料上证明了商周时期成都平原和中原地区的关系十分密切。

金沙遗址出土部分玉器与越南出土的玉器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反映出商周时期成都平原和东南亚地区亦有交往。这在古代文献中也能找到证据。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可见，当时巴蜀的商品已远销到孟加拉地区。又《水经注》卷37 叶榆河条引《交州外域记》，记载了公元三世纪中期蜀王子征服交趾，称安阳王—事。我们认为商周时期的蜀国和现东南亚地区可能已有往来。

#### 四、金沙遗址发现的重要意义

金沙遗址之所以引起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是金沙遗址的发现有其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 1 对巴蜀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金沙遗址是四川省继广汉三星堆之后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其重要性完全可与广汉三星堆遗址并驾齐驱。—方面，金沙遗址出土遗物的总体风格与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礼器相—致，表明成都金沙遗址和广汉三星堆遗址有共同的文化渊源关系，两遗

址的文化关系十分密切。另一方面，两遗址又各有特色，金沙遗址出土的丰富多彩的金器在全国极其罕见；玉器不仅数量众多，种类丰富，且十分精美；雕刻得栩栩如生的石跪坐人像、石虎等数量众多的石雕像在国内十分罕见。通过对金沙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极有可能加深并改变对三星堆祭祀坑的认识，解决很多巴蜀文化的未解之谜，推动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

## 2 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金沙商周遗址是本世纪初我国最重大的考古新发现之一，填补了四川省、西南地区的文物考古工作多项空白。金沙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对全世界都十分关心的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研究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 3 金沙遗址的发现对研究成都平原商周时期的历史和成都市城市发展史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金沙遗址所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应是商周时期蜀王的重器，再加上其北部黄忠遗址的大型宫殿式建筑群及周围其它重要遗存的发现来看，金沙遗址很可能是商周时期一处大型古蜀文化中心遗址，是古蜀国又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很可能是古蜀国的都城之一，是目前已知的成都最早的城市，这又将成都市的建城史从距今2300年提前到距今3100年。金沙遗址的发现，为成都市旅游业提供一个新的热点，是新世纪成都的一大文化品牌，对它的研究与开发有利于成都市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它符合省政府、市政府在新世纪将四川省建设成为旅游大省、文化大省的发展目标。

## 五、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极为关注

金沙遗址的重大考古成果经国内外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后，

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前来视察工作的中央、省、市领导，有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佩云、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费孝通、王汉斌，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省人民政府省长张中伟、省人大主任谢世杰、财政部部长项怀城、国家计委副主任李子彬、省委副书记席义方、成都市委书记王荣轩、省委秘书长李崇禧、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李昌达、李进、省人大副主任徐世群、省政协副主席章玉钧、成都市人民政府市长李春城、成都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维义等。国家文物局张柏副局长、文物保护司副司长宋新潮、国家文物局专家组也专程到金沙遗址指导工作。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曾荫权为团长的香港西部考察团、台湾宗教代表团也专程到工地参观。各级领导对金沙遗址的重大考古成果均给予了高度评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纷纷到工地参观指导工作，认为这是21世纪初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金沙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在国外的新闻媒体中掀起一股强劲的金沙遗址旋风，中央、省、市各级新闻单位和国内外的一些新闻机构及各网站争相报道，使这项考古工作的社会效应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

## 成都解放的一段珍贵史实（下）

### 刘明回忆王克诚王竞生整理

策反城防司令      维护地方治安

根据全国时局的变化，我们及时召开全组会议，认真分析了成都局势：在我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残留成都之敌，大多数已丧失战斗意志，争取敌军成建制起义或投降的条件已经成熟。分析会上大家形成共识：目前的工作方法应该是主动出击，即以驻成都敌军整个后勤系统为对象，全面开展形势宣传和政策攻心，促其成建制起义。

会后，我们以中共地下党名义，把近期全国形势和我党我军对待蒋方人员的政策打印成文，秘密发送给敌军各个单位还没逃走头目，并要求他们权衡利害，选择放下武器不与人民为敌的道路，保护好单位的一切公有财产，待解放后，我军将按功过大政策兑现。

密信发出后，返回的情报表明，敌人营垒中浮动不安的情绪有明显稳定，找我方表态愿意立功赎罪的人接踵而来。

在12月中旬，因我军尚未完全对成都形成包围，一些坏人又嚣张捣乱起来，敲诈勒索，伤害人命，社会治安更加混乱。

在这重要时刻，我向同志们提出了一个冒险计划，即单身前访敌城防司令官，借他的力量平息骚乱，稳定社会。我话音刚落，同志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并说成都还是国民党的天下，到敌人窝里去十分危险。

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我进一步说明了我的根据和分析。简

单地说，单身密访伪城防司令，必须把握两个问题：一是城防司令部有无力量平息骚乱；二是城防司令是否听我们的规劝。而这两个问题，我已从城防司令手下一高级助手（此人是我军校时的同志，又是山西老乡）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

伪城防司令叫曾庆集，四川安岳人。早年曾在美国骑兵学校受训，毕业后分配到国民党驻美国大使馆当武官7年。抗战胜利后，提升为上海港口少将司令，专门负责美国军事援助事宜。后因人事不和被罢官。由于他熟悉四川情况，通过地方势力活动，于1949年6月，才被委为“第44补给分区少将司令”，而此职权势不及港口司令，平时在言语之间不满情绪常有流露。此时，国民党主力被歼灭，权贵们纷纷逃往台湾，他被留在成都无人过问，更是惶恐不安。

当时，曾手下有一个警卫营的兵力。不久，重庆的第4补给区、西安的第7补给区也撤退到成都，各有一个警卫营。曾以东道主名义，把3个警卫营合并成立一个后勤系统警卫团，归其指挥。之后，曾乘成都混乱之际，以这个团为基础，把分散各处的保安团收编成两个团，也归其指挥。另驻成都的一个宪兵团，也划入其系统。这3部份兵力约为6000人，而曾对外号称是一个军，自称军长。

在这样的背景下，是年12月中旬，曾自行成立了“成都城防司令部”，自任司令，宪兵团长郭某担任副司令，并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公布了“约法”。城防司令部成立后，曾、郭对兵力部署作了分工：宪兵团负责城内治安，其余几个团分兵把守4个城门和近郊，曾坐镇市中心司令部。

通过上述分析，大家认为：曾的实力是可以维持成都秩序的，问题在于曾的政治态度如何？是否听我们规劝？基于以下三个理由我认为曾不至于翻脸，一是10月1日新中国已宣告成立，我一

野、二野两路大军已逼近成都；二是曾非蒋军嫡系，在国民党内部遭排挤；三是把我扣起来或杀了，他个人也得不到丝毫好处，而解放后我党我军肯定会找其算账，何苦出此下策。我在介绍了曾庆集的情况后，又强调了密访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经大家同意我的意见后，我即提出密访曾的具体方案 and 对策。决定当晚由我同李子才二人各带一支枪前去，我离开后由高怀廉同志负责情报小组工作，并作两手准备：若万一我俩回不来，被扣留或被杀害，情报小组全体成员彻底隐蔽，停止活动。杨、石两同志仍以秘密方式继续与各单位保持适当联系。我军进城后，由高负责向上级汇报情报小组随胡宗南部进入成都后开展工作的情况，并处理好善后工作；若密访成功，城内秩序由城防司令负责，出现骚乱以武力制止。同时，我即出城到前线向部队首长汇报，争取我军尽快入城。

散会后，我把高叫到一边，介绍了他需要掌握的情况，并将情报人员和情报关系名单等秘密资料交给了他，还将经费、账目等都一一作了交待。

当晚黄昏过后，我穿着伪军装，带着李子才乘车来到位于东城根街与金家坝交汇处的城防司令部。我即掏出一张印有刘本厚姓名、西安绥署上校联络参谋职务的名片，交李递给卫兵，卫兵过目后，马上送进门内值班室，很快出来一个自称是王副官的中尉军官。

我说明来意后，王副官对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把我们引进一个大院，两旁耳房大概是办事机构，此时，电话铃声、打字机声轧轧作响，人员进进出出。中庭是个大会议室，王安排我们坐下，即去向司令报告。几分钟后，王出来说，司令有请，把我们引到后院上房门口，一个勤务兵掀起门帘让我们进去。

坐在写字台后的一位身着美式军装的少将缓缓挪开座椅站起

来，看上去约有50岁左右，中等个头，面部白皙，戴一副金丝眼镜，不用介绍我就知道是谁了。我即近前向他行了军礼并叫了一声“曾司令”。曾斯文地伸出右手不冷不热地握了握我的手，左手拿着名片看了一眼说：“喔！刘参谋，请坐！”

我坐定后，王副官、李子才及那个勤务兵都退出上房。我看无人，便先开口说：“我这个不速之客，曾司令是不是有点意外？”

“不，不！你老兄是……？”曾言不由衷地顺口支吾着回答，一面在揣摸我说话的含义。

“我是中国共产党西北局派到成都工作的代表（这是我们一时权宜这么说的）有紧急情况要和你面谈。”我提高嗓子严肃地说。

曾一听，先是一愣，随即后退半步，拉长嗓子低声“啊——”的一声睁大眼睛盯着我。但他情绪很快平稳下来，语气很不自然地说：“噢，失迎，失迎！不知老兄有什么见教？”

我开门见山地对曾说明了来意，并向其提出了两条明确要求：第一，成都解放之前的过渡时期，作为地方主管，有责任保护好国民党后勤系统遗存的一切物资财产，因为这是人民的血汗，不得损失、丢失和私分。第二，现在我已向你公开了身份，我和我的同志们的人身安全，你必须全部负责。若能按我们的意见执行，解放后我们将按政策对你过去的罪恶既往不咎，并论功行赏，给出路。

为了引起他足够的重视，我又指出，现在时机紧迫，我大军即将进城，失去机会，你的命运就不由自己掌握了，你要当机立断。接着，我又向曾简要介绍了全国军事、政治形势。

在我说话时，注意观察了曾的表情：他一会儿皱起眉头面显难色，一会儿低头在想什么，似乎心情起伏不定，思想斗争激烈，但始终没有翻脸为敌。

等我说完话，他一反刚进门时姿态，亲自过来给我泡上热茶。然后，搓搓手坐下来以略带激动的语气说：“刘代表，你老兄刚

才的话真是金玉良言，给我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我完全接受，完全照办。不过兄弟我手下兵力有限，万一哪里照顾不周，还望老兄多多原谅。”接着，曾发泄了一通对国民党不满的话后，又说：“目前成都正处于混乱中，为了不出意外，咱们今天的谈话，要严加保密。明天我派两个心腹归你使唤，有事情就叫他们去办。我尽快把司令部的电话给你接通，还可随时在电话上谈，这比较方便。至于你们的人身安全，兄弟当然负责，我马上选调一个步兵连 担负你们的驻地警卫。”

我站起身来和曾第二次握手，向他表示友谊和感谢。随后我们又坐下，继续商谈了若干工作中的细节问题，交谈融洽。我怕家里同志们担心，即告辞，曾派车送我们回到四圣祠医院。

第二天一大早，城防司令部派胡、黄两参谋带一连部队来，说保护我们。我要高怀廉同志去安排警卫部署事宜。那天以后，医院里的病人就转往他处，门口设了双岗，院内装了一部电话机，内外通讯很快勾通了，医院就成了我们的临时指挥所。

那天下午，我派杨开元同志陪同曾庆集到几个后勤单位去视察，一方面介绍相互认识，另一方面告诉这些单位遇到坏人捣乱制止不了时，即向城防司令部报告。

直至成都解放，曾的态度都是认真负责的，成都解放后，曾被任命为西南军区后勤部副司令员。

### 赶赴前线接头 迎先遣队入城

不久得到情报，经过激烈战斗，我第一野战军18兵团部队已经进至新都县城。为了尽快把城内情况报告给部队首长，我决定高怀廉同志随我一道出城与我军接头。

成都到新都30多里路。城内是城防司令部的部队，城外是国民党正规军驻防，再向北才是解放区。通过这一防区，若被挡住

盘查是个难题。

但考虑到情况紧急，我们迅速作好了出城的准备。家里工作由杨开元同志暂时负责；“中间地带”的盘查问题，就假称“察看公路有无破坏，载重汽车车队能否通行”。恰好行动之前，我弄到一份空白通行证件，临时填上“察看公路运输能力”的假任务，可搪塞应付。

26日一早我们出发了。这天，天气晴朗，但冷得厉害，我和老高都穿着棉军大衣，曾庆集派一辆吉普车送我们，并叫胡参谋随车陪同出城。吉普车沿川陕公路北上，冬天路上，人车稀少。约行驶10多里到了一个小城镇边，几个国民党士兵斜背着枪，没精打采地在公路中间来回走动。

我们走近时，我以那份“察看公路运输能力”的假通行证，顺利地通过了敌军防线。

小车继续前进，公路坑坑洼洼，车行很慢，路上不见军队，少数农民在田间耕作。走了不大会儿，忽然听见远处有人大声在喊：“站住，干什么的？”

司机急忙把车停住，我们立即下车。迎面走近两位年青战士，手里端着枪，不远的田埂后面，还有几个战士卧在地下用枪对着我们。

没等互相答话，高怀廉看了一眼就高兴地放声大喊：“解放军！解放军！”急忙走近战士身边自我介绍，正说着，又走过来一个佩带手枪的干部，把我们带到路边盘问，尽管高已介绍了情况，但我们没带任何证件，他不敢轻信，但没有敌视我们，他对我们说：“车就停在这里，你们跟我一块到后边去。”

那个干部走在前面，我们走在中间，一个战士端着枪跟在后边。越走行人越多，不一会到了新都。进城一看，满街倾巷都是英姿焕发、风尘朴朴的人民解放军。转过一条街口，正行进间，

街上有几位解放军认出了高怀廉，指着老高大声喊：“这不是高怀廉吗？”同志们相互问好后，高拉住其中一位干部到街旁，询问部队首长有谁在这里？对方回答贺龙司令员就在这里，18兵团的首长也在。我俩交换意见决定去见贺老总。这位干部带我们去贺老总的临时指挥所。

这是一间普通的旧式平房，中间摆一张四方桌，上面放着军用地图和文件，另有一部军用电话机，桌下火盆木炭正在燃烧。靠墙的一张木床上放了两条单薄的军被和一件皮大衣，这就是贺老总的临时办公室。

我们进去时，贺司令员正和张经武参谋长坐着谈话。见我们进屋，就站起来和我们紧紧握手，并对我们说：“你们辛苦了！随手拉我们也坐在火盆旁边，然后用慈祥的目光端详着我们。我首先介绍了我们的来历，接着汇报了成都市内的敌军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我们的建议——请部队尽快入城。

汇报开始时，只有贺、张两位首长在场，汇报到中途贺老总听出主要是后勤系统的问题，就派人把西北军区后勤部长陈希云、政委杨尚高也叫了来。汇报中首长们边听边问，特别问到成都当前不稳定的因素。我们汇报的时间很长，直到天快亮了，贺司令员才站起来作了结论性的指示：“成都情况现在已经完全清楚了，这两位同志汇报的情况很重要，为了迅速稳住人心，安定大局，明天陈部长和杨政委就带一个加强营先行进入成都，一面维持秩序，一面积极准备迎接大军入城的工作。现在都去睡觉，下午就出发。”

27日下午，我们陪同陈、杨两位首长率领部队乘坐15辆军车，浩浩荡荡返回成都。动身前我问杨政委：“路过国民党野战军防线时怎么办？”他说：“今天一早已经通知国民党第5军团司令裴昌会要他们离开公路”。路上果然畅通无阻，半个小时就到了成都。

进城当天，首长和我们一起住在四圣祠医院，部队住在附近，警卫医院的部队随即也换成中国人民解放军。

晚饭过后，我通知国民党后勤系统各个单位的负责人，统统到四圣祠医院礼堂来听解放军部队首长的讲话。目的是让他们相信我们确实是共产党，有利于他们迅速转到革命的立场上来。

绝大多数人没见过解放军，听解放军领导讲话更是第一次，人人新鲜好奇，特别关心的是共产党来了后怎么对待他们这些人，所以早早就来会场，把大厅挤得水泄不通。7时半，我陪陈、杨首长走进大厅，人们纷纷自动起立，长时间热烈地鼓掌欢迎。

我主持会议，向大家介绍陈、杨两位首长后，大声宣布：“现在请第一野战军后勤部杨政委讲话。”此时台下静无声息，人们抬起头来齐向台上看。

杨尚高政委健步走到台前，环视会场一周后在台前站定。“同志们，朋友们！”杨政委开始用宏亮的声音讲话了。他讲了一个半小时，主要讲了四点内容：第一，声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已经进入成都；第二，介绍了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请大家监督；第三，要求到会各单位在正式军管前认真负责，坚守岗位；第四，通报了全国军事、政治形势，指出留在四川的一切国民党部队、单位和个人都要顺应形势，为四川最后解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杨政委讲完，又是一阵长久的掌声！

此后，我们积极参与迎接解放军正式入城仪式的筹备工作，布置后勤系统各单位准备办理移交事宜。

12月30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贺龙、政委李井泉、参谋长张经武等首长率领18兵团部队，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这一天，成都几十万军民倾城出动，挤向街头，兴高采烈，鼓乐喧天，迎接人民自己的军队入城。留在成都地区的原国民党机关、军队、学校也全部参加了欢迎队伍的行列。

我军进入成都后，相继成立了西南军区和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军区首长命令我们参与军事接管，任命我担任西南军区后勤工作团主任，直到 1950 年 5 月初，接管工作才大体告一段落。我们情报小组的成员除高怀廉同志调回原部队、杨开元和龙兰二同志留西南政法学院外，我和于遵甫、王倚霞、戴丹枫、张世杰、石士超、韩凤林、张逸、董彦明等同志先后回西安本部。

# 邓柯渡口造船记

王 涛

金沙江上游的邓柯渡口（四川省石渠县属）江面宽约50米，水流平缓，千百年来靠用牛皮船摆渡维持两岸人民的往来。1950年秋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从这里经过以后，原本荒凉冷落的老渡口，终于有了大小木船摆渡，从此方便了两岸人民的交往，给石渠（四川）、江达（西藏）两县的经贸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作为当年进藏部队的一名记者，特将部队在这里建造木船的经过记叙于后，以纪念西藏解放50周年。

人民解放军第18军52师154团为进藏部队北路（指经康定、甘孜一线入藏）先遣团，于1950年4月28日由四川乐山行军至川西北重镇甘孜。5月6日，该团二营在团政委率领下于5月16日前进至金沙江畔的邓柯渡口，任务是为大部队渡江西进做好准备工作。千军万马的进藏大军要从这里渡江，靠原来摆渡的几只小牛皮船显然是不行的。迅速建造出适合部队渡江作战用的大小不同类型的木船，确是当务之急。

其实早在先遣团出发前，军首长即令机关有关部门到乐山沙湾区大渡河畔动员、雇请了12位建造木船的能工巧匠，随同部队一起到达邓柯，并以他们为主要骨干办起了造船厂，解决造船渡江难题。团首长任命五连副政指李明福为厂长。李明福鲁西人，黄河岸边长大，世代船工之后，本人当过木匠，是当厂长的最佳人选。造船厂下设船只装钉组10人，全由乐山工人组成；伐木解板组6人，由乐山工人2人、邓柯藏族工人2人和部队2人组成；铁工组4人，由部队1人及邓柯藏族工人3人组成，负责供应造船用